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年第4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第22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熟人社会、面子与村庄公共性再生产

严 红

(武汉大学 社会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村庄公共性关涉基层社会内生性秩序,重建公共性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面子"是发育在熟人社会中的价值共识和行为规范,是实现村庄公共性再生产的可行机制。通过解构村民面子交换、面子积累和面子竞争的日常性生活实践行为,发现面子具有功能互惠性、社会交互性、伦理价值性三重逻辑,能依托熟人社会中人情关系的长期性、舆论公道的有效性和道德伦理的约束性,以亏欠-补偿机制、嵌入-转化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生产出公共交往、公共规则和公共精神,实现村庄公共性的再生产。存在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面子具有可塑性,既秉持着传统的控制功能,又可以嵌入新的价值内涵,有必要强化国家权力对面子观的引导功能,使其在村庄公共性再生产中发挥出积极效应,以国家与社会力量的平衡增强农村内部发展动力,重构稳定有序的乡村秩序。

关键词:面子 ;熟人社会; 公共性再生产; 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C9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23)04-0118-12

一、面子与村庄公共性再生产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村庄公共性流失是当前农村面临的突出问题,深刻阻碍着乡村振兴和现代化进程,重塑村庄公共性迫在眉睫。乡村社会内生性传统的有效转化,能够增强其对社会行为的正面引导[1],使重塑公共性具备可能性。研究表明,村庄公共性受制于熟人社会的行动逻辑与关系结构[2],而"面子"仍然是村落熟人社会中强有力的地方性共识,是引导人们生活交往的重要价值规范[3],即使在全面流动的互联网时代,中国社会的各方面扩展依然离不开面子的运作[4]。因此本文从村落场域中的"面子"出发,探究熟人社会中面子与村庄公共性的互动关系,力图为村庄公共性的再生产提供可行思路。

(一)国家与社会视角下的村庄公共性

村庄公共性是建立在村庄社会结构基础之上,能够对生活于其中的个体具有规范和约束作用的一套规则和文化认同[5]。众多学者基于对具体村庄的考察,形成村庄公共性流失的一致判断。阎云翔提出家庭从村庄中退出,农村生活正趋向私密化[6];李培林参照法国"农民终结"提出了村落终结[7];田毅鹏等则基于城市对农村人口的吸纳趋势,提出村落过疏化危机[8];吴理财等基于乡村社会"半法治""功利化"的流变趋势做出公共性渐趋消解的判断[9]。已有研究倾向于将村庄公共性的流失置于国家-社会视角下进行解释。一方面,村庄公共性流失源于税费改革之后国家权力从乡村社会"退场",村庄内生组织力量、权威性认同和凝聚性权力还没有形成[10],乡土团结陷入困顿[11];另一方面,乡村社会生态本身发生变化,传统时期的道德规范、地方规则、宗教信仰、村

收稿日期:2023-02-23 **DOI**:10.7671/j.issn.1672-0202.2023.04.0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0CSH050)

作者简介:严 红(1994—),女,河南信阳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基层治理、农村社会学。E-mail:yanhong9496@163.com

规民约等公共性赖以依存的载体渐次解体[9]。

基于此,关于如何重塑村庄公共性,现有研究形成了国家干预论和激活社会论两种立场。其一,国家干预论提出应该以积极的国家干预重构村庄公共性,强化权力的引导作用,以加强基层党建[12]、壮大农村集体经济[13]、完善村庄社会组织[14]、发展农村社区服务[15]等方式促进乡村公共性发展。其二,激活社会论认为要重新激发出乡村社会内生性力量,找到激发村民归属感与认同感的落脚点,以此为契机来构造村庄公共性。因此要在熟人社会内部将乡村社会过去断裂的纽带重新铸造起来[9],以参与公共事务为基础,基于个体之间的互动所形成的关系结构[2],将农民个体重新嵌入乡村社会。

综上,国家干预论强调寻找外生力量自上而下进行干预,忽视了村庄公共性受制于熟人社会的行动逻辑与关系结构[2]。激活社会论强调激活乡村社会内部的力量,学理上具有可行性,但缺乏相关实证经验。此外,单向度地依托村庄内部力量生长出公共性,对处于转型与变迁中的乡土社会而言可行性不高。以上两种思路都对重建村庄公共性提出了建设性意见,但是不难发现,国家-社会视角预设了国家与社会的二分性与对立性,忽视了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即国家在乡土社会中寻找到关键的内生性力量进行内外联动,以国家与社会力量的平衡实现村庄公共性的再生产。引入"面子"视角对此进行推进,正是本文的研究目的。

(二)将"面子"研究带入公共性之中

中国人面子的最早研究源于传教士史密斯,面子是中国人的气质具有复杂的内涵[16],林语堂也认为中国人是为面子而活着,面子内含着中国人的行为规范[17]。一些华人研究者立足于本土文化,将中国人面子实质定义为:地位声望[18]、恭敬服从[19]、社会认同[20]等概念。已有研究中,面子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面子是个体与社会交互的产物。心理学视角强调面子的个体性,面子是个体的一种自我心像[21],即个体根据他人的正反评价而形成的自我感受[22]。社会学视角则更加强调面子的社会性,更加关照面子的关系性、互动性与控制性。面子代表个体所追求的一种社会尊重和认同,面子实现依赖于他人的评价,意味着个体对社会规范的服从[19]。不同的学科视角各有侧重,二者并不矛盾,表明面子既涉及个人的主观判断又关照社会的客观评价,既与个体的尊严有关,又与其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相联系[23]。正是个体与社会的交互性,使面子具备沟通行动与结构,联结个体与社会的重要价值[24]。

第二,存在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面子具有可塑性,既秉持着传统的面子功能,又可以嵌入新的价值内涵。若熟人社会解体,面子观缺失,村庄社会交往会沦为单纯的资源交换,人情往来蜕化为利益竞争,社会交往将会陷入交换失衡和竞争失控的状态[25]。但相关研究发现,村庄传统的结构性力量并没有彻底消失,面子观念等仍在发挥作用,能够以自身的结构回应外部力量,呈现出新的村庄面貌[26]。实证研究发现面子具备积极的正功能,是乡村社会的一种非正式制度[27],具有维系公序良俗的社会控制功能[28],在处理乡村公共事务过程中发挥着重要效用[29]。面子依然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评价[30],有利于熟人社会秩序再生产[31]。

因此,面子一方面仍然秉持着传统的社会控制等功能,另一方面其价值内核具有可塑性与再生性,能随着社会的变迁而相应调整。这表明我国传统规范正在消解,新的公共规则尚未体系化建立,面子观能够被现代治理理念、社会文明观念所塑造,依托面子来重建乡村社会公共性具有可能性。即使是在现代社会,同样可以通过观念引导,形塑出与现代国家相适应的面子观,塑造村庄公共性。

尽管面子具有互动性、他律性、交换性等公共属性,具备再生产村庄公共性的可能性,但是学界却缺失"面子"与"村庄公共性"相关联的实证研究。基于此,本文立足于熟人社会中农民日常生

活实践,创新性地提出将乡土社会农民的面子实践纳入村庄公共性的研究视野,分析面子对村庄公共性的形塑机制。具体而言,将“面子”视为构建乡村社会公共性的关键资源,主张国家以“面子”为实践抓手,通过对农民面子观的积极引导,发挥出面子潜移默化的正面功能,重建乡村社会公共性,也是对国家与社会力量相平衡的“第三条道路”的有效实践。

本研究的调研点D村是隶属于河南省南部的一个传统村庄,位于大别山腹地,村内有耕地约2600亩,人口2340人。选取D村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学界更加关注“城中村”“拆迁村”“空心村”等少数典型村落,对处于“城市化”与“过疏化”之间占大多数的几十万普通村落关注不够[32],亟须对普通村落的发展命运进行关照。D村正是几十万普通村落之一,将其作为代表进行研究,关注其村庄公共性的再生产实践,不仅能为众多普通村落提供现实参考,也对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D村作为案例村的代表性与典型性源于以下特征:第一,D村与大部分农民家庭再生产的方式具有一致性,仍然保持着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33]。第二,在可预期的生活规划中,父代在托举子代进城之后,将普遍留守村庄。D村大多数父代在城乡社会的生产角色是一代农民工,他们是“撑不出去的土船”[24]。农村仍然是大多数父代的理性选择,村庄仍然承载着他们落叶归根的价值归属和回村养老的生活预期,故其有动力积极维系乡村社会的交往关系,熟人社会本质特征依然存在。面子是村庄社会结构的产物,当村庄仍然寄托着村民的生命价值和生活预期时,面子便有了实践空间。因此以D村作为案例村,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可观察性。

基于上述思考,本文将熟人社会作为面子的运作场域,探究熟人社会中面子形塑村庄公共性的实践机制。本研究的思路概括如下:首先,对熟人社会的面子进行解构,明确面子的乡土内涵和实践要素,从功能互惠性、社会交互性和伦理价值性三重属性出发建构面子的解释框架。其次,面子实践是村庄公共生活中的做人之道,对村民日常生活中的面子实践行为进行深描,探究面子的实践逻辑。第三,对面子的实践结果进行讨论,探讨面子如何在熟人社会中再生产出公共交往、公共规则和公共精神,解构面子形塑村庄公共性的具体机制。文章的落脚点在于,如何通过乡村内生资源“面子”的有效实践,实现熟人社会中公共性的再生产,对面子在村庄社会中的作用机制进行具体阐释(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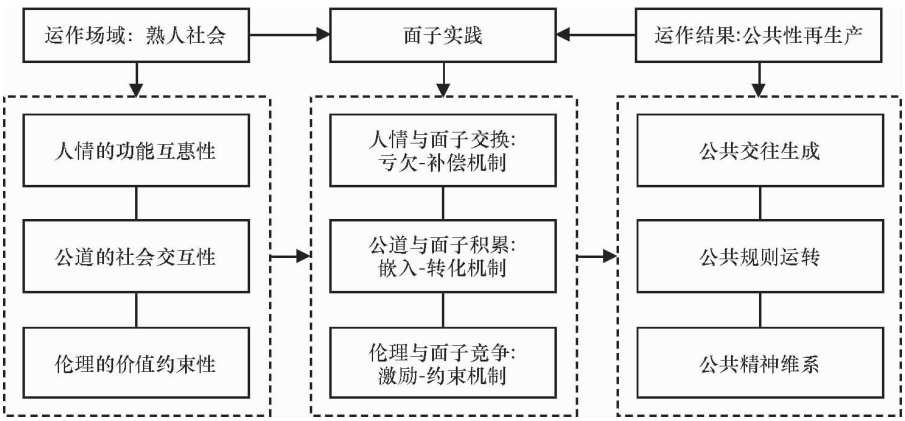


图1 熟人社会中的面子:村庄公共性再生产机制图示

二、熟人社会中面子的乡土内涵与实践要素

(一)面子的乡土内涵

基于中国情理社会的具体语境,将面子的乡土内涵定义为:面子是嵌入在乡土社会中的非正

式制度,是行动者与社会情境互动的产物,也是村庄传统伦理与现代规范互动的结果,获得面子意味着个人的行为符合社会共识性规范,获得了他人的公共性认可,面子具有引导个体行为符合社会规范的现实功能。

熟人社会中的面子是实现村庄公共性再生产的一套机制,本文将基于农民日常性生活实践探讨面子功能互惠性、社会交互性、伦理价值性三重逻辑,以此建构面子的解释框架。第一,面子本身具有功能互惠性,是熟人社会的流动性资源。村民之间互相"给面子"是熟人社会的生活方式,能满足个体之间生产生活互惠的功能性需要。第二,面子的生产具有社会交互性,面子是个体与集体互动形成的社会性评价,获得面子代表个体交往行动获得了社会集体性认可。第三,面子具有伦理价值性,面子观意味着集体性认同生产出的伦理性规则。支撑面子观生产的价值系统是村庄社会强有力的地方性共识,面子观是不以个体意志为转移的伦理规范,是村庄场域内的一整套约束性规则。因此,熟人社会中面子具有的功能互惠性、社会交互性和伦理价值性三重属性,最终都统一于熟人社会的日常生活互动中,依托于熟人社会中的人情关系、舆论公道和道德伦理三个实践要素进行具体的社会运作,形成一整套机制实现熟人社会公共性的再生产。

(二)面子的实践要素

"面子有价"是熟人社会的行为逻辑[34],熟人社会内嵌着面子的实践要素。通过将面子置于完整的村庄情境和村民日常生活实践中,基于面子功能性、社会性和伦理性三重属性,挖掘出熟人社会中面子运作所依托的实践要素,即人情关系的长期性、舆论公道的有效性和道德伦理的约束性。

1. 人情关系的长期性

人情是乡土社会面子实践的基础,中国关系社会中能够通过"互相给个面子"完成互助和交往,面子依托熟人社会中人情关系的缔结与长期循环保障互助功能的稳定性。

第一,面子通过人情体现,个体的人情关系圈范围是面子网络的直接外显。D村村民将彼此之间的人情关系称作"共礼",即在红白喜事上参与彼此的人情往来,"共礼"范围越大,表明让渡的人情越多,彰显出的面子也越大。位于地方网络中的个人一旦获得了面子,会通过"讲人情"的方式将自己的面子网络共享出去[4],彼此之间通过互相给面子建立更加亲密的"自己人"认同和紧密的人情关系网。

第二,面子网络即互助网络,面子依托于人情关系的长期性实现互助关系的稳定性。D村的"共礼"范围是村民小组,不同于血缘关系的先赋性,在小组地缘基础上形成人情关系圈是为了满足互助的功能性需求。最初,为了满足农业生产的互助需要,小组内部村民彼此给面子参与对方的人情往来,以面子网络塑造农业社会稳定的互助关系。比如红白喜事时小组内部互帮互助借用锅碗瓢盆、桌椅板凳。在当前阶段,面子依然是小组内部可以共享的资源网络,面子网络更为发达的人共享面子资源,帮助他人解决问题。

人情的让渡是面子生成的基础。讲人情、给面子是熟人社会中村民基于互助需求长期衍化而成的生活方式,面子的功能性寓于人情互惠之中,以人情关系的长期性保障面子功能的稳定性。

> 案例1:谈起村里的人情往来,村民L表示:"即使我们都觉得人情压力大,但是谁也不会贸然断了人情,在村里只有彻底撕破脸皮,不要面子的人才会不走人情。你不走人情,下次人家也不上你家的礼,等关系断了找人帮忙都开不了口。"

2. 舆论公道的有效性

之所以说"面子有价",是因为面子不是凭空产生的,面子产生于公共性的社会交往,来自他者的正面评价,即个体只有在公共交往中积极地进行自我呈现,获得来自他人正面的社会评价,才能够在村庄舆论公道中获得面子。

面子的社会性在于面子不是个体单向度的自我认同,而是通过参与社会交往,得到来自他者

的评价和反馈,评价标准是村庄内部的共识规范,惩罚手段是社会内部“一传十,十传百”的舆论压力。在传统熟人社会中“知礼数”“讲公道”是村庄舆论的本源依托。礼数、公道背后是已经被熟人社会成员所内化的公理规范和地方性共识。破坏礼数、不讲公道者会被议论,少数人的闲话在高密度交流的村庄中能被传播成具有普遍性的舆论,最终形成集体压力,让那些破坏规矩者、不合作者在村庄评价体系中失去面子,被社会边缘化[35]。正是村庄社会里的道德舆论压力使“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村民能够顾及脸面,主动约束自我行为。

舆论公道的有效性是面子实践的前提。熟人社会中面子是个体威望、声誉的社会性表达,舆论公道的社会性机制仍然在发挥作用。由于舆论公道的社会性依托是地方共识规范,因此可以对此进行引导,形成与现代文明相适应的面子标准。

3.道德伦理的约束性

熟人社会中已经孕育出一套自发的“日用而不自知”的道德伦理[36]。面子是一种价值体验,寓于地方社会主流的道德伦理之中,能以污名化、边缘化等方式对违反社会伦理的人进行指责,使其对自身不合理行为感到羞耻,以达到约束目的。

“唾沫星子淹死人”,在传统熟人社会中,村庄内有一套默认的公序良俗和道德伦理,墨守共识规范的社会成员们彼此监督,一旦有人破坏了规范,便会被其他成员说闲话,这种闲话最初代表着一种隐秘的公共性,它会在村庄公共性的交往过程中通过多人参与实现传播、发酵、反馈,形成集体压力来约束私人生活[37]。道德伦理代表着村庄成员们相似观点的集合,是一种非正式控制手段,使做出不合理行为的个体被公开地孤立、排斥甚至贴标签边缘化,在村庄中失去认同感和归属感。个体若不修正自身行为会进一步失去面子,并且随之而来在村庄中受到实质性的惩罚,对其参与村庄公共生活造成极大影响。一旦个体成为村庄中没有脸面的人,无论是在生产互助上被边缘,还是在日常交往中被疏离,都会产生尴尬、跌份的后果。并且这种排斥性的后果具有传播扩大性,村庄生活的基本单位是家庭,个人的行为会进一步波及家庭的脸面,甚至使家族蒙羞,在村庄公开的人情仪式中掉价。更为重要的是村庄个体成员丢了面子的不当行为会被村集体成员传递记忆,严重还会使其子代、孙代蒙羞,甚至形成“没脸见列祖列宗”的负罪心理。

可见,虽然面子本身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是在熟人社会日常生活实践中,面子能够基于功能性、社会性和伦理性三重属性,形成以人情关系的长期性为基础,以舆论公道的有效性为前提,以道德伦理的价值约束性为动力的实体性面子[31],激励和约束着个体的行为选择。

三、面子实践:村庄公共生活中的做人之道

王德福曾用“做人之道”对中国农民如何在村落熟人社会中完成自我实现进行了精彩论述[25]。熟人社会是面子的运作场域,村民个体在熟人社会公共生活中为获得面子而展开的日常性生活实践,即村民“做人之道”的微观展演。

(一)知礼数:面子交换中的人情平衡

面子本身是一种可流动、可交换、可积累的社会资源,只要按照地方性共识进行交往,将个体之间的人际关系处理好,即使呈现出“随大流”的行为状态,也能保住最基本的脸面。面子的基础要求是村民个体与个体之间能互相给面子[38],在集体交往中表现为人情互动中的“知礼数”,即通过“到场”“上礼”“还礼”的人情循环给对方面子,双方按照礼数进行人情往来完成彼此之间的面子交换。

在村庄公共生活中最基本的礼数便是人情往来的规则,遵守人情秩序被村民定义为“知礼数,懂得人情世故”,明白人情世故是村庄中为人处世的必备要求,否则就会被定义为“不会来事”而失去面子。村民在村庄交往过程中要坚持互相走人情,互相给面子,通过人情关系的长期性,来实现

面子资源的可持续交换。人情往来追求的不是即时结清,而是将平衡镶嵌在长期的关系预期里,以长期关系里的结平衡账为交往标准。当有人在人情关系圈中只愿意收取,不愿意给予,就是擅自打破了人情往来的平衡,会因为不会做人不知礼数而失去面子。

生于斯长于斯的村民会在村庄范围内形成人情关系网,尤其是红白喜事能将大部分村民卷入其中,村民以"礼数"为准则,在人情仪式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践行着各自的行动。首先,办事的东家是仪式的主角,人情仪式与主家的脸面紧密相连,是其交往能力、人缘关系、人脉圈子的直接体现。如果主家准备的酒席数量没有被坐满,空了很多位置,是极其丢脸面的事情,参加的人越多意味着主家在村里越有威望,反之就会被嘲笑没人缘,在脸面上过不去。其次,对于这场仪式中的宾客来说,更重要的是按长期践行的规矩上礼、吃酒、捧场,维持好彼此之间的人情往来,以人情交换的长期性,维持住人情往来的平衡性,实现对自身脸面的保护。向对方上礼是给对方面子,下次自己办事对方捧场是给自己面子,既是人情往来的交换,也是彼此的面子交换。最后,上礼记账的公开展演与约束。红白喜事中,上礼记账是基本规矩,账房先生登记的礼单是公开性的,每个宾客都可以看见到场的宾客名单和上礼数量,谁没来上礼或者谁家上礼少都是公开的,在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本公共性账本,不仅在意自家人情,也对村庄其他人的人情关系网络心知肚明。在村里存在"共礼"关系的亲戚朋友不会无缘无故中断人情往来,真的断了就意味着双方是彻底撕破脸皮,日后不会再来往了,这既让办事的主家没有脸面,自己也会因为不还人情被标榜为"不顾脸面"的人。

因此普通村民在村庄内保护面子的基本做法就是随大流走人情,延续人情本身既"能使对方脸上有光彩",又能积累自己的面子资本,是双方在"礼数"这一地方性共识下完成的面子交换。一次人情往来便是一次面子交换,长期的人情平衡即可保住面子,避免因面子交换的断裂而被村庄边缘化,遭遇社会性死亡。

> 案例2:村民表示:"人情关系是老辈上传下来的,你来我往的,他给我送了,我不还礼,岂不是我不会做人,掉自己面子,在村里打照面都尴尬。有些人即使在外打工,遇到红白事也会托人上份礼,把人情延续下去,不然就是不懂礼数忘了本,是做了不要脸面的事。"

(二)结人缘:面子积累中的声望激励

面子代表着个体在村庄中的声誉和地位,村庄社会结构中的面子不是均衡分布的,面子具有社会性的分层结构,形成面子的等级评分。"知礼数"的面子交换是最常规的"保面子"实践,在此基础上"要面子"则更强调个体要在面子交换的基础之上,广泛而主动地介入村庄公共生活去"结人缘",满足他人期望,在长期的舆论中积累声望和地位,最终在普通村民中区分出来,获得区别于一般人物的特殊面子[38]。

村民积极"结人缘"进行面子积累,源于村庄熟人社会中个体面子是在长期公共生活实践中检验、积累而来的,既是"声望资本"的彰显,也是"能力水平"的象征。熟人社会中,面子通过声望分层形塑出权威结构,上层的有权威者能在村庄中进行社会性的权力运作。D村本身没有成立正式的理事会来操办村里的人情仪式,但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了一个"无形理事会"。村庄内那些说话公道、有威望、有面子、懂礼仪的老人经常会被其他村民请去帮忙主持红白喜事,久而久之,在村干部的推动下,这一批人就被固定下来成为村里的"理事会"。他们在村庄内有脸面有号召力,会说话会办事,是村庄的道德权威。对于破坏了村庄规则的人,理事会将引导舆论进行教导劝说,如果有村民坚决不听劝不改正就会受到舆论的指责。D村处于面子上层者是村庄公认的德高望重者,在村庄评价体系中他们是"公道"的显化代表,无论是矛盾纠纷调解,还是村里组织公共品供给修路,抑或村民自组织办庙会,都会请他们出面"说公道话,办公道事"。"公道"是对个体声望的认可,既意味着正面的声誉评价,又不断再生产着权威,实现面子的可持续积累。对于这些德高望重者而言,组织这些事情的动力并不是为了获得经济性的收入回报,而是能获得社会性的声望激励,

有面子意味着获得了其他村民的广泛认可和普遍尊重,“不仅自己脸上有光,家里人脸上也能跟着沾光”。

面子能在“结人缘”过程中通过积极的社会赞许和认同发挥特定的行为激励和约束作用,对符合村庄规范的行为从正面进行声誉激励,对不符合规范的行为从反面进行约束。如果个人的面子能更进一步转化为整个家族或集体的荣誉和脸面,会对其行为产生更强的正面激励作用,促使个体积极遵守村庄规则维护自身脸面。

案例3:村民W是村里退休的小学老师,W退休以后也闲不下来,承头办庙会,带头修水井,甚至贴钱为村里做事。问其动力,W表示:“虽然我退休了,但是别人见我都会打个招呼递根烟,还是客客气气地叫老师。我多做点事也对得起别人给我好名声,退一步讲,别人愿意找我帮忙,也是看得起我,觉得我能有本事给他解决问题。”

(三)有归属:面子竞争中的集体伦理

在村庄熟人社会中,面子被赋予了价值,个体行为符合村庄价值体系才能形成归属性意义。个体在村庄公共生活中所获得的面子,一方面于纵向上叠加列祖列宗脸面,影响子孙后代的社会评价;另一方面则在横向上归属于集体的价值体系,个体通过积极地参与公共生活、约束自身行为和回应集体价值体系获得面子体验。

村庄公共生活中的面子承载着个体的价值归属,会对个体的行为选择形成影响。面子的价值标准又是被村庄社会所形塑而来,集体性的价值观念能够随着以“面子”为载体的社会性竞争扩散至所有集体成员[39],因此如何避免面子价值体系走向私利和异化就十分重要。D村的面子竞争中,村集体积极介入,以符合国家与社会秩序的“公序良俗”引导面子观朝着对集体有利的公共性方向发展,最终面子竞争不仅未异化,反而能加深个体的集体归属感,强化了集体的凝聚力。正向的面子竞争有利于个体在集体中确认自己生活意义和生存价值,是维护村庄社会团结和集体感情的一种常规且有效的方式。

D村是由几个杂姓门子构成的小亲族村庄,村内在湾子基础上被划分为8个小组,小组与小组之间避免不了因为资源争夺、人情场面等因素形成面子竞争。D村分布在河流两岸,涨水期对村民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受影响最严重的是2组和5组,经村里向上申请政策,可以给2组5组各建一座桥。但是政府补贴资源有限,只能以奖补形式提供一部分资金,前期基础工程和后期不足部分需要小组自己筹工筹劳完成。村干部给2组和5组开户主会,引导村民形成公共认识,修桥这件事不仅关乎个人,更涉及各自所在集体的利益和脸面。小组有面子,村民也能跟着沾光,小组没面子,村民生活在其中也同样觉得丢脸,强调集体与个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为了不让别的组看笑话,2组5组都积极同意修桥,自组织小组内家家户户捐钱出工,顺利完成修桥任务。村民认为,大家不争馒头争口气也得把桥修完,这是小组的脸面问题,否则会被别的小组笑话是“小组不团结做不成事”。

可见,D村虽然存在面子竞争,但是并没有异化为村民个体之间的恶性攀比。村集体引导村民形成了“一个人发展得好有面子,不代表一个大家一个组也有面子,整个组都有面子才是真的有面子”的集体性面子观,使村民在界限清晰的竞争中形成了以集体认同为基础的面子观。面子观所内含的地方性共识和价值观念是非正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集体认同为基础的面子竞争,反而有利于激活个体对集体面子的维护,激发出村民维护集体荣誉的主体性和责任感。最终,以集体为基础的面子竞争能够以“公”的标准压制“私”的欲望,使村民与所属村庄在价值归属上形成紧密的共同体。

因此,熟人社会中的面子不是孤立抽象的存在,公共生活中面子交换、面子积累与面子竞争等实践行为正是依托于人情网络、舆论公道和价值伦理,使农民在公共生活实践中完成“做人之道”。

四、熟人社会中村庄公共性再生产机制

中国是一个情理社会,该特征使面子具有一定的运作空间。熟人社会中的面子具有功能互惠性、社会交互性和伦理价值性,以上属性使其在熟人社会中孕育出的面子交换、面子积累和面子竞争实践行为成为形塑村庄公共性的重要路径,能够在公共交往、公共规则、公共精神三个维度上实现了村庄公共性再生产。

(一)面子交换与公共交往再生产:亏欠-补偿机制

在熟人社会中,村民之间以人情长期的施报平衡为基本原则进行面子交换,遵循非即时结清的特点,人情来往中自我的"亏损"可以转化为自身的"面子"[31],从而对交往过程中利益相对"受损"的一方形成补偿,在下一次人情往来中再互换身份,形成新的亏损与补偿关系。在熟人社会长久的生活预期中,面子亏欠与补偿的长期循环有利于保障村民之间形成稳定的互动关系,促成公共交往的稳定再生产。

面子交换是维持人情往来可持续性的动力,长期的面子交换内含着亏欠-补偿机制,以获得社会性面子来补偿经济性的人情亏损。其一,在熟人社会亲密社群内部,个体交往中的人情亏损可以同等置换为面子。其二,人情亏损程度与面子呈现正向关联,人情亏损越厉害,意味着个体越有面子。在红白喜事中,酒席越亏损,意味着愿意"给面子"赏脸参与的人越多,主家也越有面子。在人情往来上的规则中,不遵循绝对的经济理性,而是用社会性的面子价值弥合经济性的利益亏损。其三,人情往来遵循"施报平衡",不是要实现绝对的等额,而是要报大于施,若亏欠了他人人情,在下次"走人情""还人情"时,就要想方设法以增加礼金等方式加重人情分量,在适当的时机予以归还补偿。一方还过人情之后,并不意味着双方关系就此结束,而是在此基础上形成身份互换的新的亏欠关系。村民之间保持着给予—亏欠—补偿的面子交换良性循环关系,有利于持续性的公共交往。面子能够以人情循环为基础,促进公共交往的长期性、稳定性发展。

概言之,村民能依托于人情往来生产面子,以社会性的面子获得弥补经济性的人情亏损,形塑出长期平衡的交往关系。面子的可持续交换意味着个体的资源扩散[22],面子交换不仅使双方能就此构建关联,还能通过资源扩散得到对方关系网的补偿,扩大自身的人情关系范畴,在更大范围内不断再生产公共交往。因此,面子交换能以亏欠-补偿机制,形成公共交往的长预期,又能使分散的个体交往集合于人情往来的扩散性实践中,实现公共交往可持续生产。

(二)面子积累与公共规则再生产:嵌入-转化机制

个体在熟人社会中进行面子积累,需要先嵌入村庄社会评价体系,遵守村庄舆论公道,以地方性共识为基础进行结人缘的长期实践,积累出正面的声望评价,转化出个体的面子。嵌入-转化的面子积累过程能够不断确认和再生产村庄中的公共规则,以共识性的集体压力实现村民的自我约束和自我控制。

其一,个体嵌入村庄公道,遵守地方性共识,回应公共性标准,获得集体性认可。信息对称的熟人社会,面子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源于社会互动中对方的评价,而评价标准是公共性和社会性的,不以个体意志为转移,因此个体行为能否嵌入公共性的社会评价体系并且获得正面的认可,是个体获得面子的前提。村民在村庄生活,需要先将自身行为嵌入村庄社会评价体系之中,与公共道德规范保持一致性。其二,村民个体将行为嵌入村庄道德价值体系之后,进行长期的结人缘实践,获得正面的舆论评价和声望积累,最终才能转化出个体面子。面子获得标准基于地域差异具有不一致性,个体积累面子的核心在于,个体的面子行为能否嵌入所处场域的价值标准之中,与地

方性共识保持一致性,在此基础上才能基于长期的结人缘实践,转化出个体的面子。

个体行为嵌入村庄共识规范,进行适应性的“结人缘”实践,最终转化为个体脸面,是个体在熟人社会完成面子积累的实践过程,面子积累过程中对共识规范地嵌入和遵守,有利于实现公共规则的再生产。由于面子实践始终是以地方性公共规则为基本标准,其实践过程本身能够不断确认村庄社会中“公”的标准,使一心为集体考虑的公道人在公理舆论中得到正面评价,获得脸面。因此面子积累过程有利于在实践中以嵌入-转化机制不断确认和强化村民对共识性规范的认同,实现村庄公共规则的再生产。

案例4:D村的面子评价标准不是个人经济收入的多少,而是能否为村里做贡献,即“老板再有钱也是老板自己的,和普通老百姓没关系,关键是老板能不能帮帮老百姓”。村民王某是建筑工地的包工头,其经济收入在村庄中属于中上层,但因其全家人常年在外生活,村庄里办庙会、修路修渠他既不出钱也不出力,并未成为村庄有面子的代表。其获得面子的转折点是2021年,为了方便管理,村委会组建了微信群,将在外工作的本村人也拉入群,形成一个虚拟的公共空间。王某在微信群里了解了村里缺乏口罩等相关物资后,积极联系资源,为村里捐款捐物,解了村里的燃眉之急。后经村干部在微信群的宣传与表扬,王某的口碑实现了逆转,跃升为村里有面子的代表,村民纷纷对其点赞。

(三)面子竞争与公共精神再生产:激励-约束机制

村民的面子关乎个体在村庄结构中的价值归属,个体的社会竞争容易引发面子竞争,但是面子竞争是否异化,关键在于面子观依托的价值基础是公共性还是私人性,是集体性还是个体性。以集体性价值为基础形塑的面子竞争是一种良性的竞争,嵌入在伦理规范中并再生产公共价值,形成村庄的公共秩序框架,并以激励-约束机制引导个体形成对集体的价值认同,实现个体意义与集体价值的联结,促成公共精神的再生产。

通过面子机制培育村庄公共精神并不是要彻底牺牲个人利益,而是将个人得失置于村庄整体之中,在认同公共价值的基础上,引导个人服从村庄社会的公共利益,以集体与个体的面子共同体实现二者之间的平衡。一方面,以正向的情感激励,激活个人对集体的主体性和归属感。集体为个体提供了生活上的互助支持与保护网络,个体会十分依赖所属的集体,当集体在面子竞争中处于下风,个体也会失去脸面,反之,村庄整体发展得好,有面子,村民也会“感觉脸上有光”。因此集体之间的面子竞争,有利于激励村民对集体形成积极的情感认同,自觉维护公共利益。具体而言,村集体可以依托资源下乡,公共品供给等实践契机,组织村民积极参与其中,将村民的关注点从家庭私人领域转向村庄公共领域,引导村民在集体性面子竞争中积极维护集体利益,培育出个体对集体的价值归属和身份认同,实现生活意义。另一方面,在面子竞争中以反向行为约束培育公共精神。个体的行为实际上是受“有必要满足他人期望”的制约[40],在一个相对熟悉的乡村社会中,村民无不期待从日常的面子竞争中获取声誉,并在这种不断找寻近期目标的过程中继续着生活[41]。当以集体性为基础的面子观成为集体性共识时,个体会自觉进行自我约束以满足他人对自身的角色期望,以此顺利获得面子。此外,对于违反面子规范的行为,村民也能以流言蜚语、贴标签、污名化等形式进行边缘化处理,形成来自他者的约束。

因此,当村庄内部形成以集体性价值为基础的面子观时,即使是面子竞争也能够发挥出面子的正向功能,实现公共精神的再生产。面子的激励-约束机制,并非制度性的强制手段,而是一种非强制性的软性力量,通过正向的情感激励和反向的行为约束,引导村民在共同的生活场域中形塑出公共精神。

五、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虽然我国农村在经历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中出现了公共性逐渐消解的困境,但一定程度上它是有局限性的,消解并不意味着完全丧失。基于血缘、地缘形成的传统联结存在弱化但不代表彻底断裂,乡村社会的结构实体仍然存续了下来[42],众多传统集体性资源也对公共性的消解形成羁绊。因此有必要对尚保有乡村公共性的村庄进行深度挖掘,追寻促成公共性维系和再生产的内生性力量。强调集体取向而非个体取向的面子观,是中国农村社会重要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27],在传统乡土社会中,面子表现出了一定的正功能,有利于社会的整合与发展。在当今社会中,虽然行动者逐渐理性化,但也仍然在意自身面子,面子对于资源获取、资本积累具有重要意义,并且面子观的内容也会随着社会的转型而不断适应性变迁。因此,即使是现代社会,面子仍然是行动者日常行为的基础,对于社会整合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熟人社会的面子沟通了村民个体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联,是实现村庄公共性再生产的重要机制。第一,在熟人社会中,面子以人情关系的长期性为基础,以公理舆论的有效性为前提,以道德伦理的约束性为动力,在村庄内部构建个体与集体的关联。面子意识能将村庄里的村民从私人范畴推向公共领域,推向集体化、公共化的村庄交往之中,将个人嵌套进村庄社会的交往网络之中。第二,面子形塑村庄公共性是一个渐进的实践过程。首先,村民个体与个体之间,面子作为村庄中的交换资源,能够基于长期性、稳固性的人情关系,通过面子交换生产出以人情为纽带,以面子为动力的持续性的公共交往,使追求维护面子的行为具有了公共性。其次,在村民个体与集体之间,存在地方性共识,当个体行为嵌入地方规范中进行长期的结人缘实践,有利于转化出个体面子。面子积累过程能够基于公理舆论,不断确认和再生产村庄公共规则。最后,村民在村庄中以实现生活意义为依托,通过面子竞争形成个人和集体的面子共同体,激发出村民在村庄生活中的主体性作用,生产出村民对村庄的公共精神,以对符合村庄规范的行为从正面进行激励,对不符合规范的行为从反面进行约束。

(二)研究讨论

熟人社会是面子的运作场域,现代性进村背景下,部分乡村一定程度上仍然保留着熟人社会的性质,为面子实践提供了空间。正如费孝通所言:“所谓社会变迁,不论怎么样快,也是逐步的,任何社会都不会有一天突然变出一个和旧有结构完全不同的样式。”[43]当前的乡村社会正处于旧的社会规范尚未完全瓦解,新的社会体系正逐步建立的过渡阶段,熟人社会的性质尚未发生彻底转变。原因如下:其一,虽然城市化、现代化冲击了乡村社会的基础,但是主要表现为城乡流动社会结构的变化,横向社会关系的变迁始终滞后于纵向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关系上仍然保留着情理社会、熟人社会的特征,自然村仍然是熟人社会[44]。其二,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主体仍然是“进不了城”的父代。普通农业型村庄的父代以“一代农民工”的角色在城乡之间穿梭,通过代际合力托举子代完成家庭城镇化的发展目标。而大部分父代则继续退守农村,维系着村庄的人情往来,生产村庄公共舆论,寄托着价值归属。因此,从父代视角出发,他们仍然对乡村社会有长远的生活预期,有动力与留守老人、妇女儿童等群体一起维系好村庄内部的社会关系与交往网络,保持着熟人社会的特征。由此可见,熟人社会的确正在发生变化,但熟人社会的特征尚未彻底消失,仍然存在于部分村落中,为面子的运作提供了关键的实践场域。

社会结构在不断变化,与其相关联的村民面子观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农村正在经历的现

代性变迁使得农民的面子观也相应发生深刻的变化,因此对面子既不能完全否定,也不能盲目肯定,而是客观对待,理性引导。通过国家力量对面子观进行正确引导,将面子与法律、习俗、文明等资源正确结合,形成公共性导向的面子观,使其与社会主流价值相适应,在村庄公共性构造中发挥出积极的正功能,重新铸造乡村社会的纽带,最终以公共性再生产增强农村社会内部发展动力,建立稳定有序的乡村秩序。

参考文献:

[1]印子. 乡村社会诚信建设中的连带责任机制[J]. 中国农村观察,2022(6):38-55.
[2]纪芳. 关系性面子、村庄弱公共性与分利秩序——基于京郊Q村的经验调查[J]. 兰州学刊,2021(3):158-170.
[3]王德福. 中国乡村社会的面子观及其地域分布特征[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34-39.
[4]翟学伟. 中国人的人情与面子:框架、概念与关联[J]. 浙江学刊,2021(5):53-64.
[5]李永萍. 断裂的公共性:私人生活变革与农民婚姻失序——基于东北G村离婚现象的分析[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35-44.
[6]阎云翔. 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M]. 龚小夏,译.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261.
[7]李培林. 巨变:村落的终结——都市里的村庄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2002(1):168-179.
[8]田毅鹏,吕方. 单位社会的终结及其社会风险[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6):17-23.
[9]吴理财,刘磊.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公共性的流变与建构[J]. 甘肃社会科学,2018(2):11-18.
[10]张良. 村庄公共性生长与国家权力介入[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24-32.
[11]吕方. 再造乡土团结:农村社会组织发展与"新公共性"[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133-138.
[12]李永萍. 基层党建、基层治理与村庄公共性——基于对佛山市南海区禾村党建创新的考察[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59-68.
[13]邹英,刘杰. 农民再组织化与乡村公共性重构:社会范式下集体经济的发展逻辑——基于黔村"村社合一"经验的研究[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6):94-100.
[14]汪阵,陈燕谷. 文化与公共性[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5:43.
[15]吴业苗. 农村社会公共性流失与变异——兼论农村社区服务在建构公共性上的作用[J]. 中国农村观察,2014(3):57-64.
[16]亚瑟·亨·史密斯. 中国人气质[M]. 张梦阳,王丽娟,译. 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249-298.
[17]林语堂. 中国人[M].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199-206.
[18]黄光国. 人情与面子[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5(3):55-62.
[19]HO D Y F. On the concept of face[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6(81):867-884.
[20]金耀基. "面"、"耻"与中国人行为之分析[J].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2006(1):48-64.
[21]陈之昭. 面子心理的理论分析与实际研究[J].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2006(1):107-160.
[22]翟学伟. 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情理社会中的社会交换方式[J]. 社会学研究,2004(5):48-57.
[23]王轶楠,杨中芳. 中西方面子研究综述[J]. 心理科学,2005(2):398-401.
[24]桂华,欧阳静. 论熟人社会面子——基于村庄性质的区域差异比较研究[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72-81.
[25]王德福. 做人之道:熟人社会中的自我实现[D].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3.
[26]桂华,贺雪峰. 再论中国农村区域差异——一个农村研究的中层理论建构[J]. 开放时代,2013(4):157-171.
[27]晋洪涛,郭秋实,史清华. 村庄里的"家"与"面子":农户为何不愿退出宅基地——基于非正式制度嵌入性的一个解释[J]. 中国农村观察,2022(4):42-57.
[28]董磊明,郭俊霞. 乡土社会中的面子观与乡村治理[J]. 中国社会科学,2017(8):147-160.

[29]严宏. 村民理事会与村级协商民主建设的探索——以安徽省 H 村为例[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6(7):94 - 99.
[30]董帅鹏. 面子再生产:北方农村婚备消费升级的一种社会学解释[J]. 中国农村观察,2021(3):86 - 99.
[31]杜鹏. "面子":熟人社会秩序再生产机制探究[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63 - 72.
[32]严红. 嵌入与整合:乡村振兴战略下村落现代转型的实现机制——基于鄂西 L 村农业产业的调查[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21(5):660 - 668.
[33]夏柱智,贺雪峰. 半工半耕与中国渐进城镇化模式[J]. 中国社会科学,2017(12):117 - 137.
[34]吴重庆. 从熟人社会到"无主体熟人社会"[J]. 读书,2011(1):19 - 25.
[35]贺雪峰. 熟人社会的行动逻辑[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1):5 - 7.
[36]桂华. 圣凡一体:礼与生命价值[D].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3.
[37]李永萍. 隐秘的公共性:熟人社会中的闲话传播与秩序维系——基于对川西平原 L 村的调研[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46 - 53.
[38]陈柏峰. 村庄生活中的面子及其三层结构——赣南版石镇调查[J]. 广东社会科学,2009(1):168 - 173.
[39]袁松. 消费文化、面子竞争与农村的孝道衰落——以打工经济中的顾村为例[J]. 西北人口,2009(4):38 - 42.
[40]汪永涛. 作为乡村社会控制手段的"面子":涵义、特征、运行机制[J].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9(4):56 - 60.
[41]陈锋. 农村"代际剥削"的路径与机制[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49 - 58.
[42]陆益龙. 乡土中国的转型与后乡土性特征的形成[J]. 人文杂志,2010(5):161 - 168.
[43]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125.
[44]贺雪峰. 半熟人社会[J]. 开放时代,2002(1):114 - 115.

Acquaintance Society, Face and Village Publicity Reproduction

YAN Hong
(*School of Sociolog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Village publicity refers to the endogenous order of grass-roots society, and rebuilding publicit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Face" is a value consensus and behavior norm developed in the acquaintance society, and it is a feasible mechanism to realize the public reproduction of villages. By demonstrating the villagers' daily life practice of face exchange, face accumulation and face competition, it is found that face has the triple logic of functional reciprocity, social interaction and ethical value. It can rely on the long-term human relationship, the effectiveness of public opinion justice and the restraint of morality and ethics in acquaintance society, and produce public communication, public rules and public spirit by debt-compensation mechanism, embedding-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and incentive-restraint mechanism, thus realizing the reproduction of village publicity. The face existing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has plasticity, which not only upholds the traditional face function, but also embeds new value connot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guiding function of state power on the concept of face, make it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the reproduction of village publicity, enhance the internal development momentum of rural society, and reconstruct a stable and orderly rural order.

Key Words: face; acquaintance society; public reproduction; rural vitalization